

新中国国防60年回顾

徐 焰

回顾历史要用多元化的视角。新中国成立至今60年国防事业,除作战问题外,还包括国防指导理论、自卫反击战、武器装备的发展、国防工业体系、后备力量建设等几个方面。从解放初至今,国防与安全的关系始终是困扰我国的一个大难题。现在国防问题上仍存在两大矛盾:即我国迅速扩展的利益与防卫手段不足的矛盾,增强防御的迫切性与外部制约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两个矛盾,才能使富国与强军获得同步发展。

一、解放初期的凯歌行进期

新中国国防建设的第一个时期,是1949年到1964年,即解放初期,还可以说成是凯歌行进期。

近代中国处于衰弱状态,重要原因是军事上严重落后于世界潮流,尤其是错过了热兵器、机械化这两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机遇。近代中国的历史证明,没有国家工业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军队机械化。因此,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就发出号召:“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

从1949年至1958年,毛泽东发出了一系列号召,要求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军,掌握最先进的技术。当时我国在国防事业上采取了两条腿走路,一面购买引进苏联的先进装备和技术,一面建立自己的科研机构开展独立自主的研制工作,并系统展开了正规化建设。

在50年代,中共中央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方面引进购买先进机械化装备,另一方面建立独立的国防体系。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援建的“156项”重

* 徐焰:国防大学战略研究部教授。(邮编:100083)

点工程有1/3是军工企业,其余主要是民用机械工业,而且做到全部配套,保证国内能独立生产。

当中国的重工业建设刚刚起步、在补机械化装备的课时,国外武器发展已经由热能武器的高级阶段(机械化装备)进入到核能武器阶段。50年代前期,毛泽东便显示了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决心,在发展核武器方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抓住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当时苏联在中国发展核武器方面帮了很大的忙,对中国援助最多的苏联领导人是赫鲁晓夫,因为斯大林给中国的武器除米格-15比斯和伊尔-28轰炸机之外都是旧装备,赫鲁晓夫上台后全面提升了援助质量,在1957年出于政治需要还同意在发展原子弹、导弹方面援助中国,这一点还是应该肯定的。不过中苏发生争吵后,赫鲁晓夫又出现反悔,1959年停供原子弹样品,1960年撤退专家,至1962年停供战斗机,此后中国的国防工业完全在自力更生的条件下发展。

在1958年反教条主义时,国内对现代化、正规化就提出了质疑,不过在国防问题上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来,因为大跃进的时候出现了普遍头脑发昏发热,国防科技战线在“两弹”问题上还保持着罕见的清醒头脑。

1964年我国爆炸首枚原子弹,同年地对地战略导弹也研制成功。我国在尖端武器方面的成就,是奠定中国大国地位的重要支柱之一。“两弹一星”的成功,从发展战略来看主要经验有两条:一是开始就瞄准世界最先进水平,起点要高;二是集中国内有限的力量在重点领域搞攻关,有所为有所不为。

二、在曲折和动乱中艰难发展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免不了经历曲折,国防事业的发展也是如此。从60年代中期起,中国国内出现了持续的政治动乱,我国的国防事业发展也出现了一个“马鞍型”。

以1964年为转折点,我国领导人对安全判断发生了完全的变化。1964年,我国在各领域的指导思想发生严重逆转:政治上以“反修防修”为纲,军事上预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经济上改变“吃穿用”方针,以战备为中心订计划。此后造成我军现代化建设的严重延误,常规装备在仿苏式原基础上也几乎未能出现质的突破。此后,国防建设中也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的现象,如过去强调机械化,1965年又提出“骡马化”。毛泽东晚年在国防建设上也出现了不可解的自我矛盾,一方面也强调搞搞尖端武器,又担心搞现代化、正规化而出现修正主义。

对国际形势的总趋势判断是否正确,直接影响国防发展战略的制定。实践证明,在世界范围内,20世纪上半叶时代的主旋律是革命与战争,20世纪下半叶时代的主旋律是和平与发展。在50年代,毛泽东科学地判断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立足于“战争地方化”。当年毛泽东曾提出一个非常精辟的思想:中国要独立,第一要

同美国斗,第二要同苏联斗。中国要发展,第一要同苏联搞好关系,第二要同美国搞好关系。60年代后期,我国出现了国家总体战略目标的失误,对国家主要战略威胁的定位,边界冲突和援外等军事斗争的指导都出现失误。解放军的员额从1958年的最低额237万,至1962年达到380万,1965年超过500万,至1969年达到631万,至1975年达640万,军队的装备与世界先进军事技术的差距在不断拉大,尤其是在世界范围的新技术革命中错过了“国际列车”。

60年代至70年代我国的“反修”斗争,包括同苏联斗争的过火,现在看起来是国家总体战略目标的重大失误。对俄罗斯传统的大国沙文主义,适当地予以斗争是应该的,将其发展为“反修”斗争并实行长期的全面战备,则如同胡乔木所说是“过火反应”。正如90年代的中国驻俄大使李凤林近年撰文所指出的:“事过多年之后,现在看来,中苏两国领导人当时对于战争可能性的判断都是错误的。值得注意的是,双方都是为了应付对方的进攻而备战,迄今还没有任何档案材料证明,双方任何一方制订过进攻对方的计划。对于这种误判的原因,需要专家学者进一步研究。”

1969年夏秋中苏关系极度紧张,甚至出现所谓苏联会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传言,这与美国的战略欺骗有很大关系。美国渲染苏联威胁中国的目的,是想使中国在美苏对峙中倾向美国。当然,中苏军事冲突果然带来了中美和解这一副产品,这在某些意义上开启了向西方改革开放的先河,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在国家出现十年动乱期间,解放军面对十分严峻的国内外环境,仍发扬光荣传统,在面临困境时忠实履行了保卫国家的职责。例如1974年的西沙反击战,收复了西沙永乐群岛,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我国国防建设在50年代的辉煌后又在60年代和70年代出现挫折,从深层次看是出于思想路线的偏差,反映了观念上不适应进入世界型现代化发展大潮的要求。当时还一度出现思想上的倒退,这不只是毛泽东的个人失误,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中国是千年的农耕社会,农耕民族对现代化的进程感到不适应,在国防建设上也充分表现出来。包括国防建设在内现代化,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最终要靠全面提高全党、全军和全民的科学素质来解决。

三、在改革开放中迎来大发展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使中国历史的发展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国防建设也迈入一个全新阶段,人民解放军的建设也在现代化、正规化和革命化的道路上再度高歌前进。

70年代末期,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在国际战略上坚持毛泽东晚年提出的“一条线”方针,联合美国和西欧国家对抗苏联。在这一时期,面向现代化,引进先

进技术,使中国军队的装备和训练打破徘徊,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面向世界科学地分析国际形势,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转变了思想认识,看到了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现实性,在军队建设中减少数量以提升质量。

80年代前期和中期,为保障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家财政支出中大幅减少了国防开支的比例,着力压缩“人头费”的比例,着重加强装备技术的科研投入。在多研制、少生产的方针指导下,一些重点装备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

1989年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国防和军队建设与改革推进到一个崭新阶段,集中精力抓的问题就是“能否打得赢、不变质”。进入90年代后,国际上高技术局部战争成为军事斗争舞台的主角,信息化战争时代的到来向中国国防事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也展现了新的机遇。江泽民代表中央军委及时提出了科技强军的要求,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使人民解放军在完成机械化补课任务的同时,及时抓住了信息化这一新契机。人民解放军实行了科技建军中心的建设方针,在削减数量的同时不断提高质量,军队的装备和信息化水平却得到大幅提升。

迈入新世纪新时期后,改革开放面向浩荡奔腾的世界大潮,推动着以信息化为中心的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面对着挑战与机遇并存,胡锦涛总书记科学地判断了国家发展和军队建设所处的历史方位,确立了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史使命。2004年,胡锦涛向全军郑重提出,军队要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证,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目前,我国面临的安全威胁也在发生变化:一是传统的安全威胁减少,非传统安全威胁增加;西部安全威胁增加,东部安全形势有所缓和。诸如能源争夺、民族分裂主义、对领海的侵犯这类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增加,使我们对国家安全也要有新的思考。现在台海两岸的关系有所发展,但是台独势力很猖獗,国际反华势力仍在阻挠中国统一。只有加强我国的防务力量,才能有效遏制强敌介入,实现和维护祖国统一。

60年萧瑟秋风,如今崛起的中国与五星红旗刚升起时那种“一穷二白”的面貌相比,已经是“换了人间”。继中国革命胜利和新中国建立,我国的建设事业又一次创造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历史奇迹。2009年的中国的国民产值和国防开支都已仅次于美国而居于世界第二位,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富国和强兵实现了有机的统一。人民解放军为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不断提高,以确保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有效应对危机、维护和平。从全局看,我国面临着两个“前所未有”——机遇前所未有,挑战前所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实现三步走,完成信息化目标,这是今后的历史任务。